

风险政治学：研究视角与范式变迁

项继权，马光选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现有政治学中相关的风险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切入，即生态视角和社会视角。这两种视角的研究只是把风险作为政治的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考察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政治后果问题，而没有涉及对风险领域内部政治现象和政治机制的探讨，也无法体现风险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理念。基于此，以风险分配作为切入点，提出风险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建构起风险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就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词：风险政治学化；研究视角；范式变迁；风险政治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3)02-0051-05

面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大量风险，数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且取得了相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政治学学科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风险展开政治学的研究，希望以此能改变目前政治学在风险研究方面相对薄弱的状况。在提出本文的新范式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已有与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探讨，以便考察学界相关研究的具体进展情况。学界已经形成的研究视角包括生态视角和社会视角两种，这里将之称为风险政治学化研究。

一、风险政治学化研究

上述两种研究视角只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某种类型的风险导致的政治后果进行了相关性探究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对风险的政治学讨论，但因其毕竟使用了一定的政治学分析工具对风险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以区别于本文所要主张的风险政治学的研究。

(一) 生态视角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亦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带来了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和气候变暖等灾难。基于此，有别于环境工程、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从政治学视角切入，对环境和生态

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环境恶化对政治系统造成的挑战以及政治系统应该做出的反应和调整。

1. 国外生态视角研究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探讨了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因而提倡一种“零增长”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科尔曼的《生态政治》一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集中模式下，参与型民主方式对生态的改善必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他提倡以社区治理的社群主义模式来对抗集权主义，以实现生态政治的目标^[1]；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提出了有关气候政治的四点建议：第一，把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勾连起来；第二，坚持气候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实现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合，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四，把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2]。之后很多学者都进入了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和成果，其中比较优秀的有安德森的《政治与环境：关于生态危机的读本》、卡普拉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托卡尔的《绿色的选择》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与绿色政治运动是同步的，伴随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进展，绿色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纷纷崭露头角，有的进入议会，有的甚至成为政治官员。

收稿日期：2012-1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06JZD0034)

作者简介：项继权(1962-)，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光选(1981-)，男，陕西西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

2. 国内生态视角研究

生态视角的政治化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邹庆治主持翻译了克里斯托弗·卢茨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穆勒-罗密尔的《欧洲执政绿党》、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等绿色政治的经典著作，从而引导了中国大陆绿色政治研究的风潮。而国内其他有关绿色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生态智慧的挖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理念的阐释应用上。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物论”观念、“和合”思想以及“道法自然”理念都可以在新的情势下应用于绿色政治研究^[3]。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根本性的批判，其中曾广泛谈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物质环境的破坏性掠夺问题，而这些理论都可以被重新阐释和开发利用。在政治生活层面，面对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在 2006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和政府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

(二) 社会视角的研究

社会视角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风险社会理论上，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主要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5]。他们认为“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6]；风险是现代性的产物，“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7] (p19)}，所以现代风险，即人造风险，往往是因现代化而发，官僚制、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民主政治、现代科技等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风险产生的根源。其中政治学视角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风险分配问题

这些理论中从政治学角度所做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贝克对现代风险分配的阐释上，他认为风险“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事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他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7] (p20)}。在这个风险定义的基础上，他认为风险社会一个是以风险的暴增和累加为特征的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挑战和要求，而风险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要体现在风险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后果上，“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7] (p31)}，从而提出了有关风险分配的命题。

2. 风险分配的逻辑

如果说政治就是有关分配的问题，那么贝克认为财富分配的利益政治和坏处分配的风险政治在分配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风险也依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但是其分配逻辑是刚好倒过来的，财富在上层集聚，风险在下层集聚，财富上的贫困与风险的累积实现了重叠，从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结构。进而他认为，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平等结构是以风险感知、处理和转嫁能力的不平等为根源的，所以“那些发现自己作为风险制造者而处于公众声讨中心的人，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8]，从而可以逃避对风险的责任承担，这就产生了“风险责任规避逻辑”。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分配逻辑：风险分配也遵守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即因为风险作用方式的无序性和超时空性，那些早先在风险中获利者，最终可能也必须承担风险的后果。从而形成了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而正是这两种逻辑的作用，使得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机制，当民众在政治议题中要对风险责任进行明确化时，却遭到现有政治系统的歪曲与打压，于是，在民意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民众就在现有的正式政治框架之外发展起来一些专门针对风险议题的社会运动，人们通过示威、游行、静坐和拒购等政治活动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议程或因此而改变。

吉登斯从社会构成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作用

机制三者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去传统化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变迁,也就出现了大量社会风险的累积,从而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面对这个失控的风险世界,在政治实践层面可以采取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走一条风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来控制 and 化解风险,其思路和贝克的观点大同小异。

3. 风险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

贝克和吉登斯被认为是风险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这种调整过程更多的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职能转变。至于新的制度安排,则往往是在现有制度无法承担新的职能的地方出现,未来时代原有的代理性质的机构可能会更多地被直接参与决策的自主性制度安排所替代。很多溢出现有制度框架的社会运动、游行示威,新的政治团体、论坛,甚至暴力行动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二、对现有分析视角的审视

现有的风险政治学化研究存在着缺陷,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1) 生态视角批判

现有生态视角的研究坚持以环境为中心,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它有利于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安全的目标,这对于解决因为现代化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管是深绿政治还是浅绿政治,都主要是针对人类行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而提出的,仅仅把目光放在环境问题上来进行思考,所以难免具有以下缺陷:其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呼吁和宗教“启示录”色彩,在面对受强大利益驱动的环境破坏行为时,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在而今道德和宗教衰微的情势下,更是如此;其二,自然中心主义的取向,提出所谓“零增长”的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基本理性常识相背离,从而在根本上很难被人们所接受,从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得势来看,就可见一斑;其三,过于注重环境要素的考量,较少考虑到影响人类安全的其他要素,因而总是被批判为“片面的真理”。

环境风险只属于现代性风险的一种,所以以环

境风险为研究对象的生态政治研究只是作为风险政治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

(2) 风险社会理论批判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表现出了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自其产生开始,就广受关注。有学者甚至因为其中涉及风险的分配、风险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变革等政治命题,就依据政治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观念,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开辟了风险政治学研究的先河,但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之所以对现有观点持不同意见,原因在于:其一,在横向层面上,风险社会理论只是将风险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们将社会风险与工程风险、自然风险割裂开来,只进行社会风险的研究,而忽视自然风险和工程风险的研究,研究视域相对比较狭隘;其二,在纵向历时性层面,风险社会理论是完全的现代主义取向,仅把目光放在对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即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有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忽视了对以往社会形态中风险现象的研究;其三,风险社会理论中涉及的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只是谈论到了风险社会阶段面临的各种类型的风险所引起的相应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并没有对其他社会形态下的风险和对其他类型的风险进行过相应的分析,其探讨仅仅停留在政治事实罗列的层面上,并没有发展出相应的风险政治理论,因而不能算是风险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3) 风险政治学化研究的再分析

上面两种理论的各自缺陷进行了捕捉,其实除此之外,两者也有着共同的一些缺陷:

第一,两者都预设了自然环境风险的终结,认为人类已经战胜了自然,并且人类已经反客为主,具备了危害自然的能力,而这一论断显然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即使是在作为这些理论发源地的发达国家,地震、飓风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依然是不可测的,至少,我们目前对地震依然不可能做到提前预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自然风险。退一步再说,就算是我们认为人类现在已经具备了足以抗衡自然的能力,甚至有了破坏自然的能力,这也仅仅是在地球范围内,如果跳出地球范围,将视野延伸至整个宇宙,那么一次我们无法预料的陨石坠落都可能让整个地球毁于一旦,遑论人类已经战胜了自然呢?

第二,生态视角和社会视角在研究对象的范围

上都具有局限性,只把某一种类型的风险或者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受限且解释力大打折扣。绿色政治只研究环境领域,风险社会仅把后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风险又何止如此呢?

总之,风险政治学化理论考察的是由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个别风险类型的风险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同时,都只是研究风险生成和风险分配过程中的个人、机构和组织的风险规避和风险化解策略或行动,而很少涉及对风险政治学领域中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政治主体和政治手段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所以,如果从政治学视角入手,一种能够涵盖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的风险,反映不同风险领域中政治现象运行规律的统一理论的出现就变得非常必要。

三、风险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现有的研究框架下,研究者往往把对风险分配的研究局限于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社会行动的调整和管理完善的关注上,而鲜见对现有风险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根本性检讨,也缺乏对现有风险分配不公正现象根源的本质性探讨。正是因为现有理论的这种不足,人们无法在实践中认识到当前风险丛生和风险分配不公背后真正的政治性根源,从而做不到从政治学的高度对风险中的政治现象进行认知,也就不能在根本上产生出风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导致由风险引发的各种危机丛生,让人们对这个时代产生了悲观情绪。为了重拾民众对时代安全的信心,本文将以风险政治学基本范式的构建作为努力的方向。

(一) 风险政治学的尝试性建构

与之前政治学不同派别的处境相似,风险政治学也面临同样的一些命题,即要从风险角度出发解释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政治以及什么是国家等,从而形成一整套风险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阐述人类社会风险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现象,为人们从风险角度出发理解政治提供理论支撑。

1. 风险政治学中的权力观

政治学中对权力的解读有很多说法,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可以用 A 的行为引起 B 的行为这样一个论断来代替 A 对 B 拥有权力的论断”,即把权力理解为“影响”,只要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实施

了某种影响,就可以认定权力关系的存在;布劳认为权力是“不管他人反抗与否把他们的意思强加给其他人的能力”^[9]。《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持相同观点,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即认为权力仅仅表示“支配”^[10],如果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发出指令,而权力客体按照指令行动,则意味着权力关系的成立。

风险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也可以被称为风险势^[11],风险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风险权力就可以被理解为风险势的造势能力,表达的是风险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风险权力大者,其施加给风险客体的风险势也就大。这里我们可以将风险权力与其所能施加的风险势进行化约,从而用风险权势来代替风险权力作为风险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按照风险势的类型,可以将风险权势分为知识性风险权势、财富性风险权势和强制性风险权势,这也就给中国自古就有的“权势”一词注入了新的内涵。

2. 风险视野中的政治与政治学

政治被理解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些价值包括道德、宗教和利益等,现有政治学研究以道德、宗教以及利益为对象,相应地形成了道德政治、宗教政治和利益政治等相关政治基本理论。其中道德政治认为政治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某种道德善,宗教政治把实现上帝或神的救赎作为政治目标,利益政治以利益的争夺与分配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

社会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种之外,也应该包括风险这种价值。如果说统治是一种权力的权威性运行态势,风险权势的垄断者就是风险统治者,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话,则政治可以被定义为风险的权威性分配过程,即由风险统治者主导的围绕着风险的分配、规避与转嫁等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而风险政治学就是研究风险政治活动所形成的学问。有多少种不同的风险类型,就有多少种不同的风险统治类型,如财富性风险统治、技术性或知识性风险统治、强制性风险统治。所以风险统治者不仅仅只限于政府,也包括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

3. 风险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观

现有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非常之多,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国家工具论”。由于人们的自私性,容易导致在经济斗争中“人与人战争”状态的出现,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国家的建立可以为经济发

展提供制度供给,在知识产权制度、财产权利制度等方面予以保障,从而可以达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外在保护性作用。就财富分配而言,现有的国家制度不仅可以保证财产的拥有者对财富的优先占有,也可以在福利制度的安排下保障财富匮乏者的一些权利。总体而言,现有的国家制度群簇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财富分配的正义与公平。

但是如果从风险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的集装箱,是风险权势掌握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和载体。因为它集风险权势的各种类型于一身,风险统治者利用国家机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风险权势的运作,制定出一定的制度安排作用于被统治者。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国家制度使得国家的边界变得清晰,在国家对社会反思性监控增强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垄断,从而将民众限制在一定的时空中,增加了国民与国家暴力风险之间的粘性。移民则成为一国国民逃脱其所在国风险统治的方式之一,因为移民就可以隔断国民与所在国风险势之间的粘性,从而从所在国的风险关系中跳出来,所以在国民感觉到承受所在国太多风险时就可以通过改变国籍或移民来寻求安全。

当然,类似的从风险角度对政治概念进行重新阐释还可以继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相关的讨论仅限于此,但这已足以表明风险政治学建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 风险政治学与政治现实

风险政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虽然现在才被提出来,但是风险政治却一直存在。人类的政治活动中,统治者们总是在全面运用财富性风险权势、强制性风险权势和知识性风险权势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国家、企业或一定的组织可以通过税收、福利等经济手段调节市场的运行和民众的收入等,从而给民众制造和施加经济方面风险。不管是巫术、宗教、医术还是科技等方面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认证效果,即对适用对象的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

以及先进与落后等进行辨别和认定,垄断这些知识精英就很容易形成对适用对象的知识性风险,病人、黑户、愚昧者及丑陋者等都是知识性风险权势运作的结果。强制性力量的存在可以控制财富分配过程,使得应用对象贫穷,比如敲诈、抢劫和征税;也可以改变知识的属性和真伪,比如文字狱、强制认证等。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强制性力量对生命本身的毁灭,行凶杀人、事故死亡、战争冲突等都是强制性风险权势运行的体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风险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在人类社会一直广泛存在,它只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从来没有被关注过而已。因此,风险政治学作为对风险政治生活的提炼与总结,相关讨论只能算是刚刚开始,更为深入的探讨仍被期待。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 [2] 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3] 周桂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 [5] 何小勇.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J].天府新论,2010(4).
- [6]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8.
- [7]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 [8] [美]马丁.权力社会学[M].陈金岚,陶远华,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32.
- [9] [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97.
- [10] 卢少华,徐万眠.权力社会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76.
- [11] 项继权,马光选.政治风险与风险政治——风险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及新范式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2012(6).

责任编辑:王 涛